

古代东北区域环境史研究综述

滕海键

(辽宁大学经济学院 辽宁沈阳 110036)

古代东北区域“环境史”相关研究已经发表了一系列成果，研究时段集中于史前、辽金和明清三个时期。为了便于学界从整体上了解和掌握古代东北区域环境史相关研究的概况，本文在综述既往成果的基础上，评估各时段研究的成就、特点和局限，并对古代东北区域环境史研究作总体的评析。

一、史前时期的研究

所谓“史前”是指有文字记载之前的时期，大体为自远古时代至距今3500年左右，主要是距今一万年的新石器时代和早期青铜时代。最早介入相关研究的是考古学、地理学、环境考古学等学科，研究集中于东北区域的西南部、松嫩平原等地。20世纪以来，特别是1949年后，东北地区的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迄今已积累了大量考古资料，其中包含着丰富的环境信息。学界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和方法对考古调查和发掘中获得的相关资料进行研究和测定，比如利用植物孢粉、植物硅酸体分析，来了解当时的植被和气候等环境状况，以及人类对植物资源的利用等；通过鉴定和分析动物遗骨，了解当时动物群属的构成，以及人与动物的关系；通过研究古文化遗址与河流地貌等环境要素的空间分布，来探讨聚落与土壤和水资源的关系等。研究的主题比较广泛，涉及人与自然关系的诸多方面，如气候与自然环境变迁、古文化的自然环境背景、文化兴衰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环境与文明起源的关系、环境变迁与生业的关系等。

从考察的范围来看，既往研究有几个不同的空间尺度：一是整个东北；二是北方农牧交错带东部；三是某个地区；四是微观局地遗址。

裘善文等《中国东北晚冰期以来自然环境演变的初步探讨》（《地理学报》1981年第3期）将东北及毗邻海域自然环境的演化综合为一个整体图式：大约于距今

12000年前东北进入冰后期,在距今5000—6000年前气候温暖湿润。在辽河下游发生了规模较大的海侵,海平面上升到冰后期的最高位置。杨志荣《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南部环境考古研究》(《干旱区地理》2000年第4期)认为,中国北方农牧交错带东南部的西辽河流域及达来诺尔湖区新石器时代考古文化三次“跃变”的原因主要是气候变化。汤卓炜《中国北方草原地带青铜时代以来气候、植被变化研究综述》(《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科学出版社,2002年)认为,中国北方现今草原地带自青铜时代以来总的趋势是由森林草原向干燥草原转化,森林面积缩小,草原或荒漠面积增大,这是游牧文化带形成的自然环境背景。

裘善文等选取了东北一些地区——东北平原西部、松嫩平原、三江平原、呼伦贝尔沙地、松辽平原、辽宁南部,对这些地区的气候、土壤、植被等环境变迁进行了研究。“辽西地区”备受关注。张小咏等《辽西北地区全新世中期以来环境变迁》(《海洋地质与第四纪地质》2004年第4期)通过对辽西北牧场泥炭层孢粉含量的分析,结合 ^{14}C 及辽西北地区其他地质记录,初步重建了辽西北地区自全新世中期以来的环境演变序列,气候和植被等环境的阶段性变化,以及对人类生业的影响。还有一些学者以微观局地遗址为研究对象,例如汤卓炜等《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孢粉分析与古环境》(《考古学报》2013年第4期)、汤卓炜等《吉林通化王八脖子聚落遗址区古生态概观》(《边疆考古研究》第5辑,科学出版社,2007年)等文。

关于降温事件和环境恶化对古文化影响的研究。朱艳等《距今五千年左右环境恶化事件对我国新石器文化的影响及其原因的初步探讨》(《地理科学进展》2001年第2期)认为距今五千年左右出现了一次全球性环境恶化事件,这次气候变化导致东北地区7000—4000a BP时段人类生业模式发生了变化。

对动物地理、动物群落与环境变迁的研究。姜鹏《东北更新世动物群与生态环境的探讨》(《中国东北平原第四纪自然环境形成与演化》,哈尔滨地图出版社,1990年)对东北更新世动物群与生态环境的关系进行了研究。王守春《全新世中期以来西辽河流域动物地理与环境变迁》(《地理研究》2002年第6期)考察了全新世中期以来西辽河流域动物群种类成分的历史变化。

对土壤、植被、湖泊变迁的研究。林年丰等《东北平原第四纪环境演化与荒漠化问题》(《第四纪研究》1999年第5期)认为东北平原的沙质荒漠和盐碱荒漠主要是人为因素对土地、植被的破坏造成的。李取生、夏玉梅、肖荣寰、吕金福等研究了松嫩平原、三江平原等地的古环境,松嫩沙地的沙漠化特征等。其中,东北区域西南部的土地沙漠化也是学界非常关注的问题。而对科尔沁沙地的研究从史前贯通至今,发表的成果较多,探讨也更为具体、详细和全面。

对水系湖泊及其历史变迁的研究成果很少。裘善文《松嫩平原湖泊的成因及其环境变迁》(《中国东北平原第四纪自然环境形成与演化》)讨论了松嫩平原湖泊的成

因及环境变迁，对东北其他几大水系的研究较少。

从历史地理学、考古学的角度来研究人地关系，集中于东北西南部的西辽河流域。胡金明等《西辽河流域全新世以来人地系统演变历史的重建》（《地理科学》2002年第5期）探讨了全新世以来西辽河流域人地系统的耦合演变进程，揭示了该区人地系统演变的历史规律和内在机制。邓辉等《从自然景观到文化景观——燕山以北农牧交错地带人地关系演变的历史地理学透视》（商务印书馆，2005年）运用文化生态学的方法，从景观变化的角度，探讨了燕北人地系统过去8000多年间的形成与变化过程，分析了这些变化的主要成因和影响。李水城《西拉木伦河流域古文化变迁及人地关系》（《边疆考古研究》第1辑）从环境背景、遗址分布及空间位置变化等方面，探讨了西拉木伦河流域赤峰地区古代遗址的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

研究自然环境及其历史变迁与古文化、文明的关系。赵宾福《东北旧石器时代的古人类、古文化与古环境》（《学习与探索》2006年第2期）讨论了东北区域旧石器时代古人类、古文化与古环境的关系。夏正楷等《内蒙西拉木伦河流域考古文化演变的地貌背景分析》（《地理学报》2000年第3期）研究了地貌变迁与文化的关系，建议从遗址选地与环境的关系、生业类型与环境的关系、资源开发与环境的关系、文化兴衰与环境的关系等开展对赤峰地区环境考古学的个案研究。

自然环境与生业模式的关系颇受关注。多数学者强调古代人类生业模式和资源利用方式与气候等环境变化密切相关。有一些成果探讨微观局地遗址区自然环境与生业的关系，如塔拉等《井沟子遗址所反映的经济形态与环境背景》（《内蒙古文物考古》2004年第1期）等。

对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变迁与农牧业起源关系的研究。关于北方旱作农业的起源问题，赵志军贡献最大，他的《探寻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的新线索》（《中国文物报》2004年11月12日）、《从兴隆沟遗址浮选结果谈中国北方旱作农业起源问题》（《东亚古物（A卷）》，文物出版社，2004年）等文从生态学角度考察了西辽河流域粟黍作物起源与发展问题，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韩茂莉《论中国北方畜牧业产生与环境的互动关系》（《地理研究》2003年第1期）认为畜牧业是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出来的生产部门，畜牧业从原始农业中分离，并由放养型过渡到游牧型，都与气候变迁有直接关系，她以内蒙古朱开沟考古发现为例，论证了游牧业产生及其与环境变迁的对应关系。

对聚落与自然环境关系的研究。前述李水城文从环境背景、遗址分布及空间位置变化等方面，探讨了西拉木伦河流域古代遗址的分布及其与环境的关系。韩茂莉发表了多篇论文，系统研究了西辽河流域聚落与环境的关系。

相对来说，学界对东北地区西南部的研究较为系统，初步建立了这个地区史前人地关系的宏观概貌。综合学界既有研究，可以说重建了部分考古学文化兴衰演替的环境背景；发现了气候变迁与考古学文化兴衰演变存在耦合关系；深入研究某些专题，例如对农业起源机制的生态学阐释就很典型。总体上采用的是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

涉及了地理学、考古学、环境学尤其是环境考古学等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开展了跨学科研究。

二、辽金时期的研究

辽、金是由历史上的中国北方民族先后建立的两个北方王朝，存续年代在公元10世纪至公元13世纪上半叶，统治地域辽阔，现在的东北曾是其核心地区。辽金两朝曾推行促进垦殖发展农业的政策，这个时期也是我国北方气候和自然环境多变的时期，由此学界开展了一些相关研究，主要运用历史地理学、历史学和考古学等学科的方法，研究范围集中于辽金两朝的核心区，论题涉及自然地理环境及其历史变迁，气候、动物地理、辽泽湖泊和沙地变迁，农牧业与环境，地理环境与民俗，自然资源保护，聚落与环境，灾害史，疾疫史等。

对气候变迁的研究。邓辉《论燕北地区辽代的气候特点》（《第四纪研究》1998年第1期）利用《辽史》中“帝王纪”“游幸表”“食货志”和同时代“宋人使辽语录”中记载的有关旱、涝、冻灾记录，对公元928—1109年182年间燕北地区的历史气候进行了复原，认为辽代燕北地区早期以干为主，中晚期以湿为主，1080年前后为气温剧烈下降时期，比黄淮海地区的同期气候变化要早约30年。

对平地松林的研究。景爱《平地松林的变迁与西拉木伦河上游的沙漠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88年第4辑）考察了平地松林的变迁与西拉木伦河上游的沙漠化的关系。邓辉《论辽代的平地松林与千里松林——兼论燕北地区辽代的自然景观》（《地理学报》1998年增刊）认为历史文献中所说的“平地松林”仅仅是一种局部的自然环境特征，与后来的“千里松林”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辽代的森林主要集中在大兴安岭南段山地和冀北山地一线，山前平原及高原地区是一些较大的片林。

对辽代西辽河流域沙漠化与环境变迁的研究。王守春《10世纪末西辽河流域沙漠化的突进及其原因》（《中国沙漠》2000年第3期）认为西辽河流域在辽代早期和辽之前是自然环境较好的“辽泽”，10世纪末环境可能发生突变，是历史时期西辽河流域沙漠化的开始。沙漠化的主要原因是气候变化。张国庆《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恶化及其原因》（《辽宁大学学报》2014年第5期）援引宋人使辽语录及使辽诗中的相关记述，结合历史文献和考古资料，探讨辽代后期契丹腹地生态环境的恶化及其成因。韩茂莉《辽代西辽河流域气候变化及其环境特征》（《地理科学》2004年第5期）综合自然科学与历史文献记载及考古调查等几方面资料，研究了辽代西辽河流域的气候变化，认为辽中期是西辽河流域气候由暖湿转向冷干的重要转折期，由人类活动造成的环境扰动叠加在自然环境变迁中，加速了环境逆转的过程。

对辽泽湖泊的研究。张士尊《辽泽：影响东北南部历史的重要地理因素》（《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9年第1期）探寻了辽泽影响历史变迁的原因。肖忠纯《古代“辽泽”地理范围的历史变迁》（《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0年第1期）考察了辽泽的历史变迁及其原因。王守春《辽代西辽河冲积平原及邻近地区的湖泊》（《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03年第1辑）探讨了辽代前后期西辽河冲积平原上湖泊的历史变迁，认为辽代独特的人文地理现象——“捺钵”制度，与西辽河流域多湖泊有一定关系。

辽金两朝是东北区域农牧业活动的重要时期，这两朝的农业开发与环境的关系备受关注，韩茂莉出版了《辽金农业地理》（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和《草原与田园：辽金时期西辽河流域农牧业与环境》（三联书店，2006年）两部专著。她还发表了多篇文章，深入系统地探讨了辽代农业与自然地理环境的关系及其他诸多相关问题。邓辉《辽代燕北地区农牧业的空间分布特点》（侯仁之、邓辉主编《中国北方干旱半干旱地区历史时期环境变迁研究文集》，商务印书馆，2006年）研究了辽代燕北农牧业的空间分布特点，探讨了这一分布特点与当时自然地理条件之间的关系。杨军《辽代契丹故地的农牧业与自然环境》（《中国农史》2013年第1期）提出游牧人口激增和过度放牧也是导致辽代契丹故地后期生态环境恶化的原因之一。夏宇旭《辽代西辽河流域农田开发与环境变迁》（《北方文物》2018年第1期）研究了辽代西辽河流域农田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生态环境与契丹畜牧业》（《黑龙江民族丛刊》2017年第3期）探讨了生态环境与契丹畜牧业的关系等。

对地理环境与民俗文化关系的研究。冯季昌《地理环境与东北古代民俗的关系》（《北方文物》1988年第1期）探讨了地理环境对东北古代民俗的产生和发展的影响。张国庆《生态环境对辽代契丹习俗文化的影响》（《文史哲》2003年第5期）围绕辽代东北地区独特的自然地理条件对生活在这里的契丹人的生活与习俗文化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系统研究。张国庆、刘艳敏《气候环境对辽代契丹骑兵及骑战的影响——以其南进中原作战为例》（《辽宁大学学报》2007年第4期）论述了气候环境对契丹骑战等军事行动的影响。夏宇旭围绕“辽代的气候特点与契丹人文化习俗”“地理环境与契丹人四时捺钵”“生态环境与金代女真人的饮食习俗”“野生食物资源与契丹社会”“生态环境与金代女真人居住及交通习俗”等诸多议题撰文进行了探讨。

对自然资源保护政策的研究。契丹女真是以渔猎为主要生业的民族，在其民族文化的深处隐含着对山林和野生动物的保护意识，也实施了一些举措。张志勇《辽金对野生动物的保护及启示》（《北方文物》2004年第2期）考察了辽金统治者保护野生动物的动因、措施和效果。夏宇旭研究了辽代契丹人对野生动物的保护举措，以及金代女真人对林木资源的保护举措。

对聚落与环境的不关系的研究。韩茂莉《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聚落分布与环境选择》（《地理学报》2004年第4期）将辽代西拉木伦河流域的聚落分为两类，并据以分析哪

类聚落对环境造成了影响。夏宇旭、王小敏《地理环境与契丹人的居住方式》(《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5年第3期)分析了辽王朝地理环境的特点与其居住方式的关系。夏宇旭《生态环境与金代女真人居住及交通习俗》(《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认为金代女真人的居住和交通习俗深受其生态环境的影响。丁绍通、韩宾娜《辽宁地区辽金古城分布与环境关系研究》(《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8年第2期)从自然环境和人文因素两方面探讨了辽宁地区辽金古城遗址分布的格局。

对灾害和疫病史的研究。张国庆《辽代的水患及相关问题研究》(《辽金历史与考古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辽宁教育出版社,2012年)考察了辽代水患的类型、发生时段和多发地区及危害、辽政府对水患灾民的赈恤、对水利设施建设的重视,以及民间救助等。张国庆《辽代的自然灾害及其赈恤措施》(《内蒙古社会科学》1990年第5期)归纳了辽代自然灾害的类型及赈恤措施。孟古托力《辽道宗中后期自然灾害述论》(《北方文物》2001年第4期)研究了辽道宗中晚期的自然灾害的特点及其社会危害,认为这与辽政权的灭亡不无关系。

综上所述,辽金时期东北区域的环境史研究取得的主要成就是:对一些重要的论题,诸如气候与环境变迁、农业与环境、地理环境与民俗的关系等进行了初步的研究与探讨,挖掘了一些相关史料,开辟了研究辽金史的新视角,拓展了辽金史研究的论题,特别是对农业与环境的关系作了较为系统的研究。但总体来看,辽金时期东北区域环境史研究还非常薄弱,最突出的问题是论题狭窄,既有论题也有待深化。即便是学者探讨环境变迁,对诸如动物和湖泊、植被和土壤等问题的研究成果也很少。研究的空间范围局限于辽金统治的核心地区,完整的辽金时期东北区域人地关系尚未构建起来。所用资料以正史典籍居多,其他如考古资料、石刻调查资料较少。辽金时期的遗存保留很多,针对辽金正史文献资料的缺乏,加强对考古资料的利用不失为一条重要途径。另外,在研究方法和思维路径等方面也有待改变。

三、明清时期的研究

明清时期东北纳入了中央王朝统治之下,因而研究这个时期东北区域的环境史必然涉及中央王朝的政策及其他相关要素。明清两朝存续的年代在公元14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所辖的“东北区域”十分辽阔。东北还是清王朝的建立者女真族的发祥地,且明清时期恰逢我国气候变化的“小冰期”,这种气候变化对东北的影响尤甚,加之明末清初的战乱及清王朝在东北实施封禁政策,明代直至清中叶,东北地区地广人稀,人地矛盾并不突出。但自清中后期以来随着大量内地汉人的移居开发,东北的自然环境逐渐发生了巨大变化。此外,明清时期有关东北的文献资料较之前要丰

富得多,存有大量档案和地方志等,为研究提供了便利。因此,明清时期东北区域环境史的研究成果较多。不过,介入这个时期相关研究的主要还是历史学界,基本沿用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论题涉及自然环境的变迁,移民、农业与环境,森林、草原等自然资源的开发与环境变迁,围场和柳条边,人地关系,灾害与疾疫,等等。

环境变迁研究。冯季昌《东北历史地理研究》(香港同泽出版社,1996年)研究了“东北名山大川的变迁”“科尔沁沙地的历史变迁”“东北地区森林的利用与变迁”。陈跃《清代东北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系统研究了清代东北地区的生态环境变迁。李莉、梁明武《明清时期东北地区生态环境演化初探》(《学术研究》2009年第10期)从宏观上考察了明清时期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的演变。关亚新、张志坤《辽西地区生态的历史变迁及影响》(《社会科学辑刊》2002年第1期)和《辽西地区生态环境的历史变迁——以辽宁西部地区为例》(《渤海大学学报》2014年第1期)考察了辽西地区生态环境变迁的人文因素及其影响。关亚新《清代辽西地区沙尘天气的特点及成因》(《史学集刊》2017年第1期)依据朝鲜贡使《燕行录》中有关记载,并结合现代气象学知识,研究了清代辽西地区沙尘天气的特点及成因。黄普基等《〈燕行录〉资料反映的16—19世纪东北南部地区冬半年气温变化》(《中国历史地理论丛》2012年第3辑)利用域外史料来研究东北地区当时的气候变化。

森林植被变迁的研究。中国森林史的研究成果大都涉及东北地区。朱士光《历史时期我国东北地区的植被变迁》(《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2年第4辑)详细考察了东北地区全新世以来至1949年前的天然植被、人工栽培植被和草原植被的变迁及其成因,认为天然植被类型的变迁主要是自中全新世进入晚全新世时全球性气候变化造成的;人工栽培植被的扩大与天然森林、草原植被的缩小,主要是因为西周王朝建立以来,特别是清后期弛禁放垦以来,随着人口的不断增加,滥垦滥伐与俄日帝国主义对森林资源的疯狂掠夺造成的。叶瑜和方修琦等采用历史文献分析、原始潜在植被恢复等多种方法,发表了多篇论文,论述了300年来东北森林草地植被的变化及其人文社会和气候等成因。伍启杰发表了多篇研究黑龙江森林史的论文。马宝建《清代至民国时期黑龙江三江平原森林变迁研究》(《北京林业大学学报》2008年第4期)研究了清代至民国时期黑龙江三江平原森林资源的演变。熊梅《清代东北地区森林消减与环境效应》(《东北史地》2008年第4期)从过度垦伐入手探讨了清代东北地区森林的变化及其环境效应。这方面的相关成果还有很多。

水系、海岸、河道变迁的研究。林汀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对辽河水系的变迁及特点、辽东湾海岸线的变迁等问题作了考察。张士尊《明清两代辽河下游流向考》(《东北史地》2009年第3期)根据对明清文献、朝鲜使臣记录、近代历史遗迹的考证,得出了明清两代辽河下游河道与今天辽河下游河道大体一致的结论。肖忠纯《明清时期辽河平原东部地区河道变迁与沼泽湿地的扩展》(《东北史地》2010年第4

期) 考察了明清时期辽河平原东部河道的变迁。

野生动物的研究。赫俊峰等《东北虎分布区的历史变迁及种群变动》(《林业科技》1997年第1期) 论及东北虎的分布及其历史变迁。张士尊《康熙二十一年“东北虎”在东北南部地区的分布》(《满族研究》2005年第2期) 依据康熙东北之行及其相关史料,考察了康熙二十一年“东北虎”在东北南部地区的分布状况、生存环境,揭示了人口与生态变迁之间的关系。

人口、移民、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倍受关注,移民史和农业垦殖史的成果最多,包括多部学术专著和多篇学位论文。在移民史研究的基础上,张士尊《清代东北南部地区移民与环境变迁》(《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考察了清代东北南部地区的移民及其环境影响;他的《清代中朝之间“甬脱”地带人口与环境变迁考》(《吉林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3期) 考察了清代中朝之间“甬脱”地带人口与环境变迁的关系。颜廷真等《清代西辽河流域人口增长及其对环境的影响》(《人文地理》2007年第2期) 考察了清代西辽河流域的人口增长及其环境影响。

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是研究的焦点。方修琦等《极端气候事件-移民开垦-政策管理的互动:1661—1680年东北移民开垦对华北水旱灾的异地响应》(《中国科学D辑:地球科学》2006年第7期) 以1661—1680年间东北移民开垦对华北水旱灾害的异地响应为实例,研究了极端气候事件-移民开垦-政策管理之间的互动关系。作为生态环境的脆弱带西辽河流域,包括科尔沁沙地格外受到关注,成果最多,考察的焦点是土地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另一个相关论题是蒙地垦荒与环境变迁的关系,学界从不同角度探讨了禁垦、放垦、农业开发的时空进程等对当时经济、社会生活、民族关系及生态环境的影响。学界也探讨了东北区域的草地、森林、珍稀自然资源的开发及其导致的环境变迁,有的研究将国家权力纳入进来进行考察。

围场和柳条边的研究。东北围场是清廷特殊贡品的采集地,东北主要有木兰围场、盛京围场、吉林围场和黑龙江围场。围场也经历了从封禁到开禁的历史,是学界一直关注的焦点。景爱、韩光辉、崔海亭、邓辉等从历史地理的角度,赵珍从历史学的角度,对与围场相关的环境史问题进行了研究。其中,赵珍《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清代围场研究》(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 从资源、环境与国家权力和管理的角度,系统地研究了围场的环境史。柳条边是学界关注的另一个焦点。关亚新《清代柳条边对东北地区生态环境的作用及影响》(《史学集刊》2010年第6期) 认为清代柳条边作为东北行政区的分界线和清朝对东北实行封禁政策的产物,在客观上划定了东北地区三个经济区(农耕区、狩猎采集区、游牧区)的界限,成为东北地区农牧林交错带的界标。

自然灾害史的研究。张士尊《明代辽东自然灾害考略》(《鞍山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 考察了明代辽东的自然灾害。陈跃《清代东北地区灾害救助研究》(《东北师大学报》2014年第6期) 研究了清代东北地区自然灾害及其救助措施。

与辽金时期相比,明清时期东北区域环境史的研究成就比较显著。研究论题有所拓展,从而丰富了明清东北地方史的研究内容。人口、移民、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的关系依然是广受关注的论题。学界也提出了一些新论题,如战争与环境的关系,民族经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甚至“环境思想史”等。研究明代环境史的成果非常少。明清时期的相关文献资料显著增多,但对这些文献资料的运用还存在很大局限,大量档案和地方志、域外文献等,均未得到充分利用。对移民、农业史的研究重在史实梳理,农业开发与环境变迁关系的分析模式固化,没有把自然系统与社会系统及其内部诸要素,如民族文化、政策等要素勾连起来进行整体考察。

四、综合评析

与传统的地方史如边疆史、民族史相比,东北区域的环境史相关研究要薄弱得多。既往研究涉及的时空范围也存在很大局限,在时间上未能连续,空间上未能覆盖。如前所述,已有研究集中于史前、辽金、明清几个时段,空间上不同时期有所不同,但均未能“尽全时空”,考察时段和空间范围尚有广阔的拓展领域。

此外,以往研究偏重于局地 and 个案研究,研究碎片化比较严重。今后应一方面继续开展和加强局地微观个案实证研究,另一方面也要作宏观性思考,尝试构建东北区域环境史的研究体系和研究框架,从整体和全局的角度来思考如何构建东北区域环境史的问题。还须将视阈放大,站在东北亚的视阈来看待和研究东北区域的环境史。

在论题选择方面,既往研究论及各期气候和植被变迁较多,但对于其他环境要素,比如动物、水系、地貌、人种、土壤等,研究不够,特别是对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聚焦不足。很少有论及自然观方面的成果。对聚落与环境的关系,近代城市环境史,历史上的环保政策和保护环境的行为,研究很少。对人口、移民、农业与环境的关系关注较多,而对于民族文化及渔猎文化与环境的关系等研究不足。今后应努力拓展研究论题,例如可以利用一些器物如玉器、陶器、聚落特别是祭祀遗址,以及其他信息来研究史前人类对自然的认识。还可利用各种地方文献资料,尤其是民族文献资料,来研究辽、金、元、清及其他时代的民族文化与环境的关系。再如历史上的战争与环境的关系,“城市环境史”等,都是今后应予开拓的新领域。

从研究方法层面来看,环境史研究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结合起来,进行跨学科研究,但既往东北区域的相关研究中二者是分离的,至少没有很好地整合。这在史前史研究中就很典型,环境考古研究中考古学与环境学密不可分,但在研究中两者的结合远远不够,存在着将环境变迁与文化兴衰简单对应的现象。历史时期也是如此,环境学与考古学之间、考古学与历史学之间基本上是各用各法。环境

史研究涉及环境学、考古学、气候学、生物学、民族学、历史学、文化人类学等众多学科的理论、知识和方法，这些不同学科各有其学科旨趣和研究方法，环境史研究立足于自然和文化之间，研究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史，须将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及其内部诸多分支学科之方法综合运用，才能切实践行真正意义上的环境史研究。

就文献资料而言，东北区域的环境史研究需要综合利用多元文献资料，包括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文献资料。史前阶段除了考古学和环境学资料外，也要努力寻找先秦时期的相关文献资料，甚至包括神话传说。历史时期除了传统的文献资料外，也要重视环境学、考古学、气候学、农学、历史地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研究资料。除了传统的正史典籍外，还要注重档案方志、民族语言文献、域外文献及调查口述等多元文献资料，以确保研究资料翔实丰富。

以往研究东北区域的相关成果中，很少使用“环境史”这一概念，既无“环境史话语”，也未在“环境史语境”中进行研究和叙事。在具体研究中呈现一种固化的线性思维，对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及因环境而衍生的社会关系关注不够。环境史需要将生态思维贯彻于具体的研究中，生态思维将人类和自然视为具有内在有机联系的整体，其主旨在于澄清和解构“人类—环境—社会”系统的结构和历时性运行机制，需要的是一种立体思维而非线性思维，需要将诸多自然和人文社会要素综合起来研究。这方面学界已发表了一些很好的研究成果可做范例，值得认真学习和借鉴。

从推动环境史和地方史及边疆史研究的角度，开展区域环境史研究有较高的学术价值。从当下环境史考察的空间尺度来看，有宏大的世界环境史研究、中观层面的地区和国别环境史研究，还有区域环境史研究。区域自然环境的统一性和文化的同质性较高，研究特定生态区域的人与自然的关系更具可行性。这样既可以发现不同自然地理环境下人与自然互动关系的独特性，亦可通过大量区域环境史研究来发现人与自然关系的共性，从而能够从整体上推进环境史研究。与中原相比，诸如我国东北、北方、西北、西南这些边疆地区有其独特之处，这种独特之处不仅体现在自然环境中，也体现在文化方面，这些地区历史上多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其生业模式和文化传统等诸多方面与内地相比有很大不同，其人与自然的的关系也呈现了明显的地方性特点。研究这些地区的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的关系，不仅能够丰富环境史的研究内容，亦可为传统的区域民族史、文化史、边疆史研究提供新视角和新范式，从而能够拓展边疆史和民族史的研究内容，最终会推进传统的边疆史和民族文化史研究。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东北区域环境史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项目编号 18ZDA174）中期成果

（责任编辑：张欣）